



鞍山师范学院

高教参考

2021年第2期

党委发展规划部（处）
高等教育研究所

2021年12月3日

目 录

高教资讯

- 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 1 -
教育部：鼓励高校开设健康教育等相关专业.....- 2 -
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意见部署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 -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 进一步提高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有效性.....- 3 -

教师教育

- 多所高校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 5 -
期末“划重点”要没了！高校都在尝试这项改革，已成趋势？- 8 -

高校视点

- 以“大美育”为引领构建育人新格局.....- 13 -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地方高校发展的战略思考与路径选择.....- 18 -

大学治理

- 邬大光：大学转型发展的时代呼唤.....- 23 -
“重心下移”激活二级学院办学活力.....- 34 -

人才培养

- 现代产业学院：产学研创开辟人才培养新路径（以东莞理工学院为例）- 38 -

国务院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

为进一步激励科研人员多出高质量科技成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从7方面提出25条举措，为创新“松绑”，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管理自主权。

一段时间以来，科研经费申请使用中存在的预算编制繁琐、项目申报流程长、经费拨付进度慢、报销难等问题，耗费了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影响了他们创新的积极性。

为让科研人员能够心无旁骛地扎根学术，意见提出，简化预算编制，进一步精简合并预算编制科目，按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三大类编制直接费用预算；下放预算调剂权，设备费预算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单位，不再由项目管理部门审批其预算调增。

科学研究具有不确定性，但经费预算却要对未来的科学活动进行具体详细的预测。针对这一矛盾，意见提出，扩大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在人才类和基础研究类科研项目中推行经费包干制，不再编制项目预算。并鼓励有关部门和地方在从事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的独立法人科研机构开展经费包干制试点。

经费管理改革的步伐也能让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意见要求，从三方面完善科研项目经费拨付机制。项目管理部门要根据不同类型科研项目特点、研究进度、资金需求等，合理制定经费拨付计划并及时拨付资金；加快经费拨付进度，财政部、项目管理部门可在部门预算批复前预拨科研经费；改进结余资金管理，项目完成任务目标并通过综合绩效评价后，结余资金留归项目承担单位使用。

为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意见提出了提高间接费用比例、扩大劳务费开支范围、合理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力度等多项措施。根据意见要求，稳定支持科研经费提取奖励经费试点范围将扩大到

所有中央级科研院所。

此外，针对科研人员烦恼的经费报销难、报销慢等问题，意见还提出，减轻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具体包括为科研人员在预算编制、经费报销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改进财务报销管理方式，推进科研经费无纸化报销试点；简化科研仪器设备采购流程，对科研急需的设备和耗材采用特事特办、随到随办的采购机制，可不进行招标投标程序等。

（来源：新华社）

教育部：鼓励高校开设健康教育等相关专业

日前，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就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提出相关意见。《意见》中指出，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开设健康教育等相关专业，支持高校设立健康教育学院，培养健康教育师资。

（来源：澎湃新闻）

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意见部署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结构优化、集约高效、安全可靠的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并通过迭代升级、更新完善和持续建设，实现长期、全面的发展。

《意见》指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信息化为主导，面向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聚焦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等方面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教育新基建）是国家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息化时代教育变革的牵引力量，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举措。教育新基建的重点方向包括信息网络新型基础设施、平台体系新型基础设施、数字资源新型基础设施、智慧校园新型基础设施、创新应

用新型基础设施、可信安全新型基础设施共六大类20项。

《意见》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家公共通信资源，建设连接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间的教育专网，提升学校网络质量，提供高速、便捷、绿色、安全的网络服务；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平台融合发展，构建互联互通、应用齐备、协同服务的“互联网+教育”大平台；依托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数字资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供给模式，提高供给质量；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利用信息技术升级教学设施、科研设施和公共设施，促进学校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一体化建设；依托“互联网+教育”3大平台，创新教学、评价、研训和管理等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有效感知网络安全威胁，过滤网络不良信息，提升信息化供应链水平，强化在线教育监管，保障广大师生的切身利益。

《意见》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健全标准规范、提升支撑能力、完善经费保障、强化监督评价。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建立多部门参与的协同推进机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本地区教育新基建的实施方案，会同相关部门将教育新基建纳入本地区的教育“十四五”发展规划、网信规划和地方新基建支持范围；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覆盖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等方面的标准规范体系，重点制定平台建设、数据治理、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标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管理、技术、服务队伍建设；地方各级教育、发展改革、财政、通信、工业和信息化等部门应加强统筹协调，优化支出结构，通过相关经费渠道大力支持教育新基建；各地教育督导部门应将教育新基建重点任务纳入对下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和对学校的综合督导评估。

（来源：教育部网）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 进一步提高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有效性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进一步提高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切实加强专业支撑和科学管理，着力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通知》明确，要加强源头管理，全方位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加强心理健康课程建设，高校要面向本专科生开设心理健康公共必修课，原则上设置2个学分（32—36学时），中小学要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纳入校本课程，同时注重安排形式多样的生命教育、挫折教育。大力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充分发挥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校园文化的重要作用，全方位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及早分类疏导各种压力，针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人际关系和自我意识等方面可能遇到的心理失衡问题，主动采取举措，避免因压力无法缓解而造成心理危机。增强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合力。

《通知》要求，要加强过程管理，提升及早发现能力和日常咨询辅导水平。做好心理健康测评工作，加快研制更符合中国学生特点的心理测评量表，高校每年在新生入校后适时开展全覆盖的心理健康测评，注重对测评结果的科学分析和合理应用，县级教育部门牵头负责组织区域内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工作，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强化日常预警防控，高校要健全完善“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四级预警网络，重点关注学生是否遭遇重大变故、重大挫折及出现明显异常等情况，辅导员、班主任每月要遍访所有学生寝室，中小学教师要与家长进行密切沟通，共同加强心理疏导。加强心理咨询辅导服务，高校要强化心理咨询服务平台建设，设立心理发展辅导室、积极心理体验中心、团体活动室、综合素质训练室等，县级教育部门要建立区域性的中小学生心理辅导中心，定期提供业务指导、技能培训。

《通知》要求，要加强结果管理，提高心理危机事件干预处置能力。大力构建家校协同干预机制，对于入学时就确定有抑郁症等心理障碍的学生，学校要组织校内外相关专业人员进行研判，及时将干预方案告知家长，与家长共同商定任务分工。积极争取专业机构协作支持，持续强化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与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协同合作。妥善做好学生突发事件善后工作，学生因心理问题在校发生意外事件后，学校要立即启动应急工作预案，第一时间联系学生家长，并在当地教育、公安等部门指导下核实情况、及时处理。

《通知》强调，要加强保障管理，加大综合支撑力度。配齐建强骨干队伍，高校按师生比不低于1：4000比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且每

校至少配备2名，加大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力度，对所有辅导员每3年至少开展1次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支持辅导员攻读心理学相关专业第二专业硕士学位，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备1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县级教研机构要配备心理教研员。落实场地和经费保障，学校应在年度预算中统筹各类资金保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础经费，确定生均标准，足额按时拨付，并视情建立增长机制。

（来源：《中国教育报》）

教师教育

多所高校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

近年来，教育部多次印发文件、出台政策，促进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协调有序发展。同时，越来越多的高校从自身出发，因地制宜地推进本校师范专业认证工作。在此过程中，高校都采取了什么措施，积累了什么经验？

★东北师范大学：真建真改，抓好关键

2019年10月25日麦可思组织了“面向专业认证的质量监测与数据举证”高校研讨会，东北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赵长明在会中做了题为《理念入心 真建真改——师范类专业认证自评自建工作的东师实践》的讲座，分享了东北师范大学师范类专业通过认证促进专业建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

赵长明提到，做好认证工作的第一步是激发学院的积极性。学院的积极性、专业和教师的积极性可能是专业认证能否真正落实的最基础的环节。对此，东北师范大学从学院最关心的两个事情寻找切入点：一流专业和学科评估。一流专业方面，教育部文件中的“两步走”战略明确要求通过认证的专业才能是一流专业，才有可能进到“双万计划”里，而且这是唯一的途径。学科评估方面，国家明确学科评估的导向，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根本在于人才培养，本科教育是培养一流人才最重要的基础，要重点考核，而专业认证可能是本科教育获得国家认可最有效的方式。当学院对专业认证的理念、价值认同之后，东北师范大学就按照时间安排全面推进，狠抓落实。

第二步，解决让学院会做的问题，主要包括梳理材料，提供支持。一方面，东北师范大学把所有相关的国家政策都帮学院梳理清楚。基于高校与行业脱离太久，很多老师都不知道中学在做什么的问题，东师建议各个学院重点研究“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及普通高中学科核心素养”和“普通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这两个指导中学教改的重要材料。学校还为学院提供两个指南，即《自评报告撰写指导书》《师范专业认证工作指南》。此外学校给学院提供了四个国家标准的材料，包括《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中学教师专业标准》《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真正让专业认证落地，把教学质量提高。另一方面，教务处还为学院提供了许多学校的材料，包括“十三五”发展规划、审核评估自评报告、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实践教学质量报告、教育运行基本状态数据、就业质量报告，以及各部门的总结、东师网站上的新闻等内容。

第三步，“抓住两个关键，扭住一个根本，强化两个保障”。抓住两个关键。一是抓培养方案，即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矩阵等；二是抓教学大纲，即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教学方式等。扭住一个根本即抓课程评价，通过评价方式的改革促进教学模式的变革。强化两个保障。一是抓共同课程，如教师教育、思政课程、大学外语、大学体育、信息技术等；二是抓专家指导，要点面结合，深入指导，及时培训，及时指导，及时评审。

★洛阳师范学院：三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二级质量监控体系

“持续改进”作为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基本理念之一，要求师范类专业认证从认证标准到认程序均需做好持续质量改进工作，并形成机制。对此，洛阳师范学院的经验是构建学校全面监控的三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各教学单位构建各具特色的二级质量监控体系。

对于认证标准中明确提出的“专业应建立教学过程质量常态化监控机制，定期对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实施监控与评价，保障毕业要求达成”，洛阳师范学院构建了教师自我监控、教学单位实时监控、学校全面监控的三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通过五维监控实现精准督导——学生教学信息员即时反馈课堂情况，校院两级督导随机听课，校领导督导检查教学情况，教学评估与质量监控中心实时监控后台数据，网上调查学生满意度，五个维度保障网上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并且，各教学单位还构建了各具特色

的二级质量监控体系，如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的五维联动监控体系，电子商务学院的多维度多角度网上教学监控体系。

洛阳师范学院还会针对青年教师群体，实行课堂教学达标认定制度。洛阳师范学院每学期均会开展教学质量改进与分析活动，收集学生教学信息员的信息，指导基层教学组织开展教研活动。所有信息均需及时向教学单位反馈，并将课堂教学达标认定结果、评教结果与教师职称评定挂钩，促使教师关注并持续改进教学质量。

★安徽师范大学：聚焦目标，健全标准，分级监管，注重反馈

安徽师范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师范类高校。自2017年该校开展师范专业认证工作以来，该校对于师范专业认证强调的“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也有了深入理解。

“建立基于产出的持续改进质量保障机制和质量文化，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教育部明确的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的根本目的，也是师范类专业认证评建工作的重点内容。持续改进的过程中建立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至关重要。在筹备认证工作的过程中，在已有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工作的基础上，安徽师范大学相关认证专业按照“聚焦目标、健全标准、分级监管、注重反馈”的原则推进专业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这些举措包括：

第一，健全院级教学质量保障组织。学院层面成立了由院教授委员会和院督导组构成的教学质量保障组织，在对学院本科教学重大问题研究决策的同时，对本科教学质量进行全程监控和指导。

第二，完善教学主要环节质量标准。参与认证的专业在培养方案、课程大纲、教学准备、课堂教学、课程辅导、考核评价、第二三课堂、教育实习、毕业论文、教学档案等主要环节都制订了质量监控和评价的方法。

第三，定期开展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教的方面，通过校院领导和教学督导听课、教务管理人员巡视、学生座谈会和学生评教等，对教师课堂教学情况予以实时监测评价并及时反馈教师个人。学的方面，定期开展学生座谈会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利用QQ、微信等渠道了解学生学习的相关信息。同时，部分专业还开展学生学习投入度调查，对学生的学习投入情况、参与情况，以及师生互动交流情况进行分析，并以此指导教学改进。

师范专业认证是优化师范专业培养布局的重要抓手，认证标准贯穿招生、培养到毕业全过程。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

不过，正如东北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赵长明所说，通过认证不是目标，认证应该变成专业建设的一个抓手，让专业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来源：麦可思 傅业洋）

期末“划重点”要没了！高校都在尝试这项改革，已成趋势？

“学生对教考分离期末考试难易度的感受，与任课教师对课程目标的把握和教学实施情况密切相关。如果没有转变教学观念、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内涵支撑，教师就容易陷入对学生期末成绩担心的纠结中。”

考前不再突击“划重点”了，“机械刷题”行不通了。教学与考试各有教师分工负责的“教考分离”改革近年来正在多地高校尝试推进。

2020年底，辽宁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推进普通高等学校教考分离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从2020年11月起在10所左右高校开展教考分离试点，并于2021年1月在试点学校全面实施教考分离；从2021年2月底开始，在全省普通高校全面推进教考分离改革，并于2021年7月基本实现主要考试课程全覆盖。

大连大学作为试点高校之一，正在有计划地推进相关工作。据悉，该校首批实行教考分离的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大类基础课等主要考试课程，如思政课、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等。其中部分课程已经积累了多年教考分离经验。

此外，学校还强调了校、院两级管理的要求。学院对尚未实行教考分离的课程，将从学科特点、课程性质和课程建设情况予以论证、指导，分阶段逐步开展。如针对地方高校专业课师资不足、专业课需要调整课程内容使其更加贴近“四新”建设要求的实际，学校和学院将在持续开展课程建设、专业认证和师资队伍建设中，加强专业课的考试改革，按照条件建设情况推进开展教考分离。

● 教考分离，题库建设是关键

考试与教学分离，怎么考？考什么？题库建设是关键。辽宁省教育厅

在发布的《实施方案》中，将“明确命题形式”作为开展教考分离的第一项主要工作任务。根据要求，各高校需结合本校实际，根据课程内容特点和有关要求，采取试题库生成命题、课程团队集体命题、校际联合命题、省级统考等多种形式。

大连大学较早开展了以课程资源建设为目标建设课程试题库工作。题库建设以购买题库、自建题库和两者结合的方式开展，通过教改立项和教学建设项目立项等形式予以资助与推进。课程题库主要运用在平时测验、期末考试和专项练习等方面。

随着教育技术的日益发展，学校还牵头对思政类、外语类和计算机类课程集中进行考试改革，建设专门的考试系统与考试场所，筛选、优化、测试、确定适宜的题库试题，并逐步完善、全面实施，使这类课程的考核过程更加简洁、特点鲜明，考核结果更加公平、可信，考核效果对促进学生强化日常的学习与训练更加有效。

上述前期工作为学校开展教考分离奠定了良好基础。题库建设基于教研室、教学团队层面完成，教师们从考核理念、内容、方法和效果评价等多方面开展题库的研究、调研、比较与实践，也促进了课程考试试题水平的提升。

● 考试改了，教学大纲怎么改？

教考分离的实施不仅是考试方法的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也同样需要“升级”。譬如很多高校在推进教考分离时，都对课程教学大纲的修订提出了明确要求。

“课程教学大纲是依据课程目标制定的教学实施方案，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也是检查和评定学生学业成绩和衡量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大连大学建工学院苗峰副教授负责的土木工程道桥方向教学团队，目前有4门专业基础和专业方向课程实施了教考分离。他认为若要将课程考核改为教考分离，首先从教学大纲的编制规范来说，至少要对原大纲中考核环节的表述作相应调整；其次从教学大纲具有衡量教学质量的功能来说，需要对原大纲中涉及教学任务、目的、内容及安排等调整到与教考分离的目标要求相一致；从教学大纲是教学实施的依

据来说,由于实施教考分离而对课程目标进行了全面梳理与完善,所以必须依据新的课程目标全面修订原大纲或制订新大纲。

他补充谈道,修订教学大纲一定要贯彻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坚持科学性与思想性、稳定性与发展性、系统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修订前,要认真梳理课程目标及内涵,明确课程对毕业生培养要求的主要支撑点,以实现培养要求为主线确定大纲修订的框架、层次与内容。修订中,要注重教学目的、内容、安排、考核、评价及其他教学环节的完整性、对应性和对达成教学目标的支撑性,体现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合理性和先进性,体现考核环节对检查学生学习效果及能力、素质培养效果的公平性与可信性。修订后,建议对教学大纲进行必要的审核与评价,并关注大纲在教师教学实践中的实施效果,推进持续改进。

❶ 不划重点,成绩会下降吗?

管理严起来了,学生忙起来了,但同时也有人担心,教考分离会不会导致学生成绩下降,进而影响学生对课程教学的评价?

关于这个问题,苗峰认为,学生对教考分离期末考试难易度的感受,与任课教师对课程目标的把握和教学实施情况密切相关。如果没有转变教学观念、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内涵支撑,教考分离在促进教学质量提高方面仅流于形式,教师就容易陷入对学生期末成绩担心的纠结中。

“比如有些课程,如果课程目标仍以传授知识为主,教师教学以教为主,教学方法以单向灌输为主,改变的只是期末考试的命题方式与试题内容,并且未作必要的检验,一定会出现学生考核成绩不同程度下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实施教考分离初期也并不少见。当然也有许多课程,积极落实学生中心理念,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课程教学的‘两性一度’,以教考分离为主线开展考试方法改革,引导学生通过自学、作业、测验、讨论、交流与总结等环节,注重对所学内容的掌握、理解与应用水平的提高,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做到严格要求、及时反馈,那么期末教考分离考试成绩与成绩分布就会基本保持正常。”

他以主讲的“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为例,在2017、2018级学生中实施“四结合”教学模式(2018年起本课程实施的新教学模式),执行“形

成性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学生、任课教师、校外第三方参与的”课程考核方案,期末终结性考试即采用外校第三方命题的教考分离考试,也进行了主讲教师命题的课程结课考试。

对考核情况进行问卷调查与比较发现,教考分离卷面成绩平均值在74~78分之间,与结课考试的卷面平均值范围一致(2018级结课考试卷面平均成绩77.3分)。并且经过调查,学生对期末教考分离的满意度超过95%,92%的学生表示因课后付出了更多的学习时间而增强了获得感,超过90%的学生表示对本课程“有兴趣”,学生自我评价的学习目标达成度超过80%,学生评教结果超过90分。

●收获:教考分离要服务于课程考试方法改革

截至目前,苗峰及其教学团队所讲授的4门课程已完成了两轮教考分离实践。实践的初衷是检验专业课在知识、能力与素质方面的教学与培养成效,是否达到课程目标、是否更加贴近学科与行业发展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是否因课程教学改革切实提高了教学质量。由于可直接借鉴的经验不多,所以课程采用完全由校外教学团队(外校同行和企业专家组成)命题的第三方主导的教考分离模式,保证检验结果的客观性、公平性与可靠性。

他坦陈,决定实施教考分离时心情很忐忑,担心因与预期效果不符而带来负面影响。不过两轮实践结果显示,学生满意、考核成绩合理、效果好于预期、学生的认可度和课程目标达成度第二轮较第一轮均有提升,说明在专业课程群中实施有意义的教考分离模式值得尝试,也有应用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苗峰和教学团队成员基于实践探索,对教考分离的实施也收获了更深入的认识:

第一,对专业课而言,教考分离不适合孤立开展,只有融入课程改革整体方案并服务于课程考试方法改革才有意义。比如对于实践性强、知识更新速度快、与行业技术发展要求密切相关的专业类课程,应从新时期行业对学生知识运用能力、专业技能、职业素质、行业情怀等方面需求的角度设计有实际意义的教考分离,特别是开展校校、校企合作,通过开放式、第三方介入等形式,实施包括教考分离在内的多样化考核方法,满足一流课程的建设要求,达到提升课程教学质量的目的。

第二，地方高校专业课因师资力量不足、题库试题容量有限、人才培养目标有差异、课程目标在知识层面趋同等，成为实现教考分离的难点。只有转变教学观念、整合多方资源、有的放矢地解决难题，才能形成有效的、有特点的教考分离。

第三，建立跨校教学团队（校校联合、校企联合），以虚拟教研室的形式开展专业方向类课程建设，是组建稳定的课程团队、保障试题容量与质量、实行专业课教考分离的有效途径。

第四，开展教考分离，首先要梳理、确定课程目标，使其符合“四新”建设要求、提高对人才培养需求的契合度，如在“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课程中突出了强化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的教学目标；其次要重整、优化课程内容，形成与之匹配、更加完善的课程设计，保证教考分离与课程改革相辅相成。

第五，实行教考分离，促进教师积极实践课程教学的“四个转变”，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如进一步思考教师教什么、怎样教，学生学什么、如何学这一关键问题；将趣味性、任务导向、翻转课堂和开放式等方法合理运用于教学中，有效增强学生的学习获得感。

● 挑战：题库建设如何持续保持高质量？

作为教育评价改革的一种实践探索，教考分离模式在实施中也会遇到困难与挑战。苗峰举例说道，比如专业题库建设相对于基础课而言，所需更新题库的时间更短、范围更广、难度更大。如因国家、行业规范标准的更新造成的部分试题时效性不足的问题，因行业发展带来的技术更新与新技术应用导致的部分试题解决方法不够新颖的问题，这些实际问题在强调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格外有挑战性。一方面是对保持与提高题库质量具有挑战性，另一方面对一线教师形成质量至上的观念、持续投入精力研究与更新试题的态度与行动提出了挑战，若要形成迎难而上、迎接挑战的氛围，需要学校的政策鼓励与支持。

此外，实施校外第三方命题需要一定额度的费用补贴，但学校原有的支持力度与当前教考分离的开展要求有明显差距。这需要学校在适时调整相关制度，如设立教考分离专项经费、加强相关管理平台建设等，确保教考分离顺利、持续开展方面提供足够的支持。

（源自：麦可思）

以“大美育”为引领构建育人新格局

美育的概念和内涵随着时代有所创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国家形象，增进民生福祉，努力推动艺术与科学高水准、深层次的互动互融，以“大美育”为宗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为中国高等艺术教育走向世界一流，构建具有新时代风范的“大美育”体系，探索了实践路径，推进了大学美育教学改革与创新，努力形成符合时代与未来发展需求的育人新格局。

“大美育”的概念和内涵随着时代发展而创新发展

“大美育”的概念最早由教育理论家滕纯提出。他认为在所有的课程中，在一切的教育教学生活中，都有美育的因素，美育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作为一种有着无穷价值的资源，“美”是人类数千年文明以来的永恒追求，关于“美”的教育，则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

美育在新时代日益受到重视，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进一步提升了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意见》指出，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首站来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参观学院校庆特别展，听取了学院学科发展汇报并关切询问了艺术与科学融合的相关实践，特别指出“美术、艺术、科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发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更多美术元素、艺术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增强城乡审美韵味、文化品位，把美术成果更好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要增强文化自信，以美为媒，加强国际文化交流”。这既是对美术设计学科的高度重视与巨大鼓舞，更是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

“大美育”的内容随着时代有所创新。就审美对象而言，除了艺术美，

自然美、社会美、科学美均是重要的审美对象，为美育的素材，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重要的审美内涵。而就美育的场所而言，社会生活的各个场所都可以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新时代的美育，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强调艺术设计专业教育、艺术通识教育并行融合，文化自信和国际视野、优秀传统美学精神传承与时代审美精神的创新有机结合，同时大力推进社会美育，将美育融入全民素质提升、城乡环境建设和产品智造之中，构建多层次美育体系，切实践行“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赋能新时代国家高质创新发展。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一直倡导“为生活而艺术”的“大美育”理念。在上世纪末，学院袁运甫等教授明确提出了“大美术”观，倡导艺术家在现代生活与社会实践中，具备在一切事物上发现美、捕捉美、感悟美、阐释美、融会美和创造美的能力。落实于教学和创作实践，就是打破专业壁垒，并向“打通区域文化体系之间的壁垒”转进。及至21世纪，前沿科技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媒介发生剧烈变革。在“大美育”概念指引下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办学目标和育人模式也相应地不断凝练发展。新时代要求学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确立美育目标内容体系；树立学科融合理念，推进美育教学改革与创新；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提升服务社会的意识与能力。

构建“大美育”的育人新格局

美育是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大美育”为宗旨，培养一流人才，构建包括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社会教育在内的多层次美育体系，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同时全面提升国际化办学能力与全球影响力。

1. 坚持文化自信，确立美育目标内容体系

学校美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构建“大美育”的育人新格局，应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

高等院校要通过美育教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和体系建设，一方面创新艺术设计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模式，突出办学特色，建设具有中国风格的一流学科专业体系；另一方面，发挥综合性大学中美学院的优势与作用，强化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艺术教育，使学生的审美水平和人文素养

得到显著提升。同时,提高社会服务意识,主动承担社会美育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清华大学面向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和世界变革的未来趋势,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明确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为此加强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的融合,将文化自信和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中,开展深入基层的艺术与设计实践,通过课程及项目实践积极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新型的中国审美价值体系,为建设“美好生活”贡献专业力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还将国家重大设计任务融入教学,让每一项设计任务都成为一次真切的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提升了师生们的社会责任意识。

学院积极践行“文化走出去”战略,展开了多形式的跨文化人才培养项目,策划组织、参与了内容形式多样化的系列重要国际交流。如“一带一路”中国艺术家走进非洲文化交流活动、“中国风格艺术设计展”欧洲巡展、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等,以及各类艺术教学交流展、艺术家个人展,增进交流的同时传播中国艺术、设计的成就。

学院以跨文化跨学科展开人才培养,致力于提升国际影响力与全球胜任力,以创作设计研究带动人才培养。学院与60余所国际知名院校建立合作,开展师生互换、联合培养、合作科研。

清华大学与米兰理工大学签署合作,共同建设中意设计创新基地,创建清华大学米兰艺术设计学院,开展研究生双学位人才培养、本部学生海外研修、高端人才培养等项目,创建国际化高端人才培养平台、艺术设计创新研究平台和艺术设计原创成果展示发布平台。

2. 推动艺术与科学融合,推进美育教学改革与创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学科建设上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强调人才培养和科研及社会服务质量与特色,遵循“三位一体”办学理念,以艺术与科学的融合为方法路径和特色,推进教学改革,培养德厚艺精的拔尖人才,赋能高质创新发展。学院着力于高层次人才培养,稳定本科生规模,逐步扩大研究生规模、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目前研究生招生规模已超过本科生。打破学科专业壁垒,面向世界一流和国家需要,展开了各类跨文化、跨学科、跨院系合作的研究生培养项目,取得显著成果。以清华“顶天、立地、育人”科研思想为指导,利用学校多学科优势资源,以艺术设计学

科特色优势积极参与社会创新,学院科研工作无论是数量和质量上也均有大幅提升,除了承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基金等传统文科项目之外,以跨学科优势实现突破,参与和立项了众多科技部项目,包括“973”

“863”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如《中国风格文化创意及智能产品设计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冬奥会首钢赛区数字化生态创意设计研究与示范》,这是设计学科首次主持立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同时,学院面向社会和产业需要承担许多重大横向研发设计和创作工程项目,全面参与国家重大美术工程和形象设计、城乡环境建设和制造业产业产品创新设计。

学院以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为基础,展开众多面向学科前沿和艺术设计领域和社会服务热点的关键问题的系列高质量学术展览和学术论坛,推动和引领学科发展。如由诺贝尔奖得主、清华大学名誉教授李政道先生与艺术名家、清华大学教授吴冠中发起,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组办的“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从中国美术馆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目前共举办了5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平台。

学院加强了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劳动教育的融合,挖掘“大美育”理念下的多种类美育资源,增设美育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新系科,开发多学科交叉融合新课程、新项目,打造艺科融合研究与实践新平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5年正式成立信息艺术设计系,是国内最早设立的研究新技术条件下艺术设计创新的专业,旨在培养艺术与科技跨界融合的人才,面向未来探索新技术条件下的设计创新和艺术表达;美术学院与计算机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建立的“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硕士学位项目,着力建设面向数字未来的艺术设计课程,培养新时代亟需的具有艺术、技术、传媒等综合知识背景的人才,获得多项国家、省部级教学奖。还有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帝国理工合作的“GID-全球创新设计”跨学科文化研究生项目,与清华金融学院、美国IDEO合作的“创领中国2035”项目,则将设计与商业、科技创新相结合,进行跨学科、跨行业探索设计专业的变革与创新。

在教学手段方面,积极探索对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以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模式创新学校课程教学,加强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学习平台建设,促进信息技术与美育的深度融合。针对造型艺术、工艺美术类课程“身教胜于言传”的特色,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以“线上线下实时互动融合”的教学方式，促进“现场”教学由知识传递逐渐向师生间的深度交流和学生体验式学习的转变。

发挥艺术教育专业优势，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提升服务社会的意识与能力

清华大学将艺术类课程纳入到全校人文素质核心课程体系，开设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的公共艺术课程，让美育全面进入清华大学课堂。学院逐步承担起全校美术类公共课程教学工作，通过设立“艺术与人文系列讲座”，推出人文系列网络公开课，面向全校开设艺术类通识课程等形式，服务全校审美教育、艺术品质和文化内涵的提升。学院开设校级选修课程从2010年的24门稳步提升至2020年的38门，年均选课人数超1500人次；实验教学中心承担实验课程占全校探究课程总数超10%，每年授课学生人数达5000人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美育培根铸魂的基础，践行“大美育”理念应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了解、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塑造中国风格。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除了主动承担社会美育责任，还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手工艺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开展了一系列课程和实践活动，并发挥艺术设计学科的专业优势，努力践行非遗生态保护理念。承担文旅部、教育部、人社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任务，组织了14期共计280名非遗传承人参加。同时师生们也走进大凉山、墨玉等偏远地区，运用设计智慧优化资源、改善现状，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兴。

良好的空间环境会以无形的力量教化众人，学校作为体现美和培育美的最佳场地，校园文化环境已成为“大美育”格局的组成部分。学院一直采用运用艺术手段规划和打造校园文化环境，采用雕塑、壁画、绘画、各类设计等美化公共空间，突出学校文化特色。

在崇尚“人文日新”的清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以“大美育”推动学校“更人文”，通过构建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社会教育结合的大美育体系，弘扬中华美育精神，培养塑造时代新人。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努力成为国家形象的塑造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优秀文化的传承者、艺科融合的引领者、创新人才的培养者。在新时代，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向美而行，以美育人，以美为媒，美美与共。

（源自：清华大学 鲁晓波）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地方高校发展的战略思考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部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提出的新定位、新论断、新要求，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教育的总纲领、总方针、总遵循。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要先行。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地方高校要在把握高等教育内外形势之变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战略思考与合理的路径选择，从而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外形势

进入新发展阶段，准确把握高等教育的新形势新变化，在新形势中积蓄势谋势，于新变化中识变应变求变，是地方高校在深度重构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中保持定力、乘势而上的重要前提。

以质图强：高等教育体量规模的深刻变化。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4002万人，毛入学率达到51.6%，完成了从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的历史性转变。这预示着高等教育开始成为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这就要求地方高校必须在“量”的合理增长基础上，努力实现“质”的快速提升，做到“扩量”与“提质”相统一，加快实现从“以量谋大”到“以质图强”的战略转型，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

多元通道：高等教育结构类型的深刻变化。“双一流”建设以来，地方高校有了更多的竞争机会和上升通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高校办学同质化的问题，有效引导地方高校在各自领域内追求卓越、争创一流。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机会争创一流。这就要求地方高校必须在分类发展的大趋势中，找准办学定位、凝练办学特色，彰显办学风格、打造办学品牌，通过错位竞争形成比较优势，走出一条差异化、多样化、特色化的发展之路。

力破“五唯”：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教育评价事关

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重塑教育生态、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坚定决心。高校要增强系统思维、坚持破立相济，努力构建符合教育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富有时代特征的教育评价制度与机制。

开放博弈：高等教育环境格局的深刻变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重大深远的影响。环境格局的深刻变化，使高等教育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开放中的博弈”，这就要求地方高校要顺势而为、应时而动，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在坚持“走出去”的基础上，还要更大力度、更高层次谋划“请进来”，引进更多的教育资源为我所用。

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

面对高等教育体量规模之变、结构类型之变、评价体系之变、环境格局之变，地方高校应当对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部署要求，按照“明确办学定位—设定发展目标—深化综合改革”的工作思路，谋划和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以办学定位明确发展方向。地方高校的办学定位要充分结合学校历史、办学现状、发展前景、所处方位等因素，进行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和综合考量。办学定位确定后，就要在相当一段长时间内不动摇、不折腾，学校发展的目标、战略、举措乃至机构设置等都要围绕这个办学定位展开。

以目标管理凝聚发展共识。高校实施目标管理具有几个显著作用：一是指向作用，使学校的整体工作不会偏离方向；二是凝聚作用，统一全校共识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三是整合作用，整合学校有限的人财物资源重点发力；四是检验作用，以达成目标为导向检验各项工作进展如何；五是激励作用，能够紧紧围绕目标激发工作潜力。地方高校在实施目标管理时，应围绕办学定位制定学校总体目标，然后将总体目标分解为校内各个部门、学院和个人目标，形成有机的“目标链”，使个体目标、学院目标、部门目标与学校的总体目标有机融合，学校通过“目标链”对每个单位的行动进行管理、检查、反馈和改进。

以综合改革激发发展动力。地方高校在实施综合改革时，一要实现“机构改革优功能”。按照“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

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理念，明确党政管理机构、资源保障机构、教学辅助机构的职责界限，对职能交叉或相近的部门进行整合撤并，对需要强化的职能进行单列，对需要充实的职能进行补充，努力构建系统科学、运行高效的行政管理和教学科研组织体系。二要实现“人事改革强动能”。学校的人事系统主要包含管理干部队伍和专业人才队伍。从两者的关系来看，管理队伍既服务于专业人才队伍，又决定着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成效。三要实现“制度改革提效能”。高校要构建以大学章程为基本准则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制度规范和约束、协调和整合、激励和导向的重要功能，实现学校治理体系整体性流程再造和系统性机制重塑，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

着力发展内涵建设，坚持特色发展，是地方高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选择。其中，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是核心、增强创新服务本领是关键、完善高校治理体系是保障。

1. 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是根本

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

树立正确方向。高校要站在政治的高度、历史的深度、世界的广度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动摇。学生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无论学校走得多远、发展得多好，立德树人的初心不能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不能丢。要切实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真，高校要回归育人主业，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办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共同行动准则。

实施科学评价。要把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手段，把“人人发展、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终身发展”的理念贯穿于评价改革之中。人人发展，就是要求教育评价要覆盖每一类学生，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全面发展，就是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要素评价，将“五育”融入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全过程。个性发展，就是要更大限度激发学生成长进步的主动性与内驱力。终身发展，就是通过教育评价改革，培养学生终身受益的素质，特别是良好的学习习惯、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健全机制手段。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把知识传授、素质提升、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融为一体。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建立学校与政府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机制，把社会资源转化为学校育人的资源。持续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把创新创业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紧密结合，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与产业变革紧密结合，与国际合作紧密结合。持续深化质量评价机制，在经费投入、政策支持上给予人才培养更多保障，积极营造重视教学、激励教学的氛围，提高教学业绩、育人成果和一线学生工作经历在教师发展中的比重。

2. 加强学科人才建设是核心

学科建设是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建设，是学校的“着力点”。人才队伍是高校的重要资源，是学校的“支撑点”，学科建设离不开人才，人才建设同样离不开学科，两者必须有机结合，才能发挥最强合力。

学科建设要注重结构布局。学校的特色、生存和发展的基因，关键看学科。要科学谋划、长远规划，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构建并完善符合办学定位、支撑学校发展的学科体系，力创高峰学科、打造高原学科、夯实基础骨干学科，进一步明确重点发展的学科和学科发展的重点。

人才和学科必须紧密结合。高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要遵循“学科为主体、学院为主责、学校为主导”的原则。学科为主体，就是要围绕学科集聚人才，不能脱离学科盲目引进。每位专业教师都应该清晰自身在“学科树”上的位置。学院为主责，就是要坚持“学院办大学”，压实学院在人才队伍建设中的主体责任。学校为主导，主要体现在制定学校学科和人才发展规划，提高人才服务保障水平，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生态。

人才引育要重视团队建设。在人才引育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团队建设，推动“钓鱼式个体”向“捕鱼式团队”转型。要有分工有合作，每位成员都是团队的一分子，不可或缺。学校要加强人才团队的“传帮带”工作，特别是引导年轻教师融入学科团队，持续激发新生力量。

3. 发挥服务社会作用是关键

做好服务社会工作，不仅是大学的重要职责和历史使命，也是促进自身发展、彰显办学特色、提升办学地位的必由之路。

增强服务社会的意识。作为地方高校，既要站在关系国计民生全局的重大课题前沿，致力于服务国家战略，又要融入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过

程之中，抓住参与行业和区域创新的机遇。社会需要高校，不仅仅是人才培养层面，还期盼高校发挥智力库、思想库和人才库的重要作用。高校需要社会，不仅仅是经费筹措层面，更多的是在社会这个舞台里面，体现价值、展现风采、发挥作用。这就是大学与城市共生共荣的密切联系，地方高校应树立服务社会的意识。

建立服务社会的机制。通过完善对接机制、畅通合作渠道、健全激励措施等，把服务社会工作深入扎实地向前推进。要建立宣传推广的机制。主动列出服务社会的项目清单和服务社会的专家名单。要落实人员的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优化联合机制，有时候甚至可以打破院系的界限，在全校范围内整合力量协同合作。要完善考核激励的机制。学校要在每年的单位目标考核中，将服务社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考核。在职称评聘和工资绩效上体现出服务社会的工作业绩，形成鼓励先进、促进工作的政策机制。

建立服务社会的载体。对于地方高校来说，服务社会的关键载体是专业学院。地方高校可探索在专业学院建立“1个服务展示平台+1个新型校地研究院+1个校企战略联盟”的“3个1”载体，加快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有效畅通服务社会渠道、提高服务社会效率。

4. 完善内部治理体系是保障

在大学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发展导向，科学构建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是我国高校尤其是地方高校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保障。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地方高校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提升党委“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水平，构筑全面从严治党“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纪委监督责任”的四责协同长效机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深入实施“抓院促系”强基行动，聚焦放权赋能、提质创优、考核激励，推动基层组织力迭代升级，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使学校发展建设与党的建设同步谋划、与党的组织同步设置、与党的工作同步开展。

推进学校内部治理现代化。高校要严格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内部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学校各个机构、各个部门的协同联动，形成高效顺畅的运行机制，

实现学校治理体系的整体性流程再造和系统性机制重塑；要深入推进校院两级治理改革，坚持“学院办大学”的导向，注重激发院系“中场发动机”的作用，把党的教育方针和重大战略部署落实到院系的各项工作中来，形成校院相互协同、相得益彰的良好工作机制。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地方高校要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为导向，多措并举、全面发力，争取率先探索形成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的教育评价机制；要注重运用系统思维，统筹推进，认真践行重师德师风、重真才实学、重质量贡献的价值导向，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要坚持破立并举，既大力破除不科学、不合理的教育评价做法，又要加快在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等方面开展实践探索与改革尝试，在破与立之间动态调整、在唯与不唯之间找到平衡，努力构建符合政策导向、契合办学规律、具有地方高校特色的教育评价体制机制。

（作者：谢树华）

大学治理

邬大光：大学转型发展的时代呼唤

本文根据邬大光教授在“首届大学转型发展研讨会”的主旨报告整理而成。

我国正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且是百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转型时间节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判断，国家已经从战略高度对社会转型、经济转型、产业转型等维度对迎接“百年大变局”提出了要求。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领域也拉开了转型的帷幕：从过去的外延式发展到提倡内涵式发展是转型，从过去的行政权力治校到教授治学再到强调治理能力是转型，从过去的制度缺失到提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转型，从过去坚持多年的人才培养模式到提倡“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是转型，要求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高校定位是转型，要求民办高校在营利和非营利之间进行选择和推进独立学院“转设”是转型，从大学教师聘任的“铁饭碗”到“准聘制”是转型，

从线下教学到线上教学再到混合式教学是转型……这一切都蕴含着对大学转型发展的期待，我国高等教育正走在全方位转型发展的路上。

一、什么是大学转型发展

探讨转型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20世纪90年代初，研究拉美“权威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斯坦福大学菲利普·施密特提出了“转型学”（Transitology）概念。同一时期，我国学界也相继出现了提倡“转型学”研究的学者。如社会学领域的孙立平教授提出了“转型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他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这种独特文明作逻辑的理解。诚如孙立平教授所言，创建转型社会学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信念：如果将中国、苏联、东欧改革前的社会形态视之为共产主义文明的话，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该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再如在经济学领域，学者们从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一特殊时代背景出发，提出了“转型经济学”和“转型政治经济学”。如陈世清教授在其所著的《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和《对称经济学丛书》中，提出了“转型经济学”概念和基本体系，他认为，转型经济学就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存在着两种转型：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的实践模式的转型。两种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真正的“转轨经济学”应该包含二者。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学界对转型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转型社会学、转型经济学以及转型政治经济学领域，三者皆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为现实背景，主要是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为出发点，所述及的“转型”有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内涵与指向，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上述学科对社会转型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正在悄然汇成“转型研究”的洪流，为打开大学转型发展的视界奠定了基础，对于高等教育领域实现转型和研究转型，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什么是大学转型或什么可以称之为大学转型发展，这是实现大学转型发展的前提。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人们习惯用发展、改革、变革、变化等概念描述大学活动中的各种变化和进步。诚然在上述概念中，都有“改”和“转”的含义，在实践中的一些改革举措也见到了效果，但似乎距离国

家和人们期待的“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大学还有较大差距，一些做法总是给人一种“形似神非”的印象。如从学年制向学分制转变，在我国已经提出了近40年，但真正做到学分制的高校还是不多，学年制的痕迹依然很浓。问题何在？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对大学转型发展的内涵缺乏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对现在的大学“型态”依旧恋恋不舍，对大学转型发展向何处去没有明确的方向感。

大学转型发展根源于社会 and 大学自身对实然状态的“不满”，根源于大学自身从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的追求，即从现存的大学“型态”走向完全不同的“型态”，使自身的“型态”逐渐向着更合理、更科学、更成熟的“型态”发展。这一过程既折射着大学主体价值取向的升华，也反映了大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行动抉择。因此，大学转型发展是思想观念、发展模式和组织结构等一系列要素的根本性转变，集中表现为一种“符合目的”与“合乎规律”的主体觉醒与选择过程。因此，大学转型发展必须具有明确的目标性、过程性和选择性，乃至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

大学转型发展实质上是一种组织战略、组织定位、组织职能、组织结构、组织基因和组织文化等一系列要素的重大改变。大学转型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或类型：其一是指一个国家的整体高等教育系统转型，其二是指一个国家内部某一类高等教育机构的转型，其三是指一所高等学校的转型，其中一所高等学校的转型发展是重中之重。只有在一定发展时期或阶段内，大学的教育观念、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发展模式、学术生态等层面发生明显变化，才是真正的大学转型发展。因此，大学转型发展的过程是理论反思、是探讨规律、是寻找方向、是引领未来。

大学转型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其一，转型的动力与主体。就动力而言，大学转型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既有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进步的迫切需求，也有大学自身内涵式发展的自省。就主体而言，大学转型发展的主体不仅仅是大学自身，还包括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尤其是政府在推进大学转型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更是我国大学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

其二，转型有主动转型与被动转型之分。主动转型是指大学的前瞻性预判，根据国家和社会转型的大趋势，主动走上转型发展之路，引领其他大学转型发展。从历史上看，大学转型发展往往是以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

为导火线，由一所大学或几所大学率先转型，其他大学随之而动，此种大学转型都属于“被动转型”。如我国在此次疫情期间推动的线上教学就属于此类。因此，利用某个特殊事件的时间节点，启动与推进大学转型就成了国家采用的有效手段。

其三，转型的过程与次序。就过程而言，大学转型发展有自上而下的转型，也有自下而上的转型。自上而下的转型往往由国家或外力推动，属于国家行为；自下而上的转型属于高校自省，具有探索的示范作用。就次序而言，不同国家不同高等教育体系的大学转型的次序不一样。以体制转型为例，有的从办学体制入手，有的从管理体制入手，有的从投资体制入手。一般说来，大学转型过程中的优先次序取决于一个国家、一所高校的实际状况。

其四，转型的方式与途径。就方式而言，大学转型发展有渐进式的转型，也有突进式的转型，前者是缓慢地完成，后者则是一蹴而就。就途径而言，大学转型的途径呈多样化方式，既可以从宏观层面的大学职能切入，也可以从微观层面的教学活动入手，时代不同，大学转型的途径不同。

总体而言，大学转型往往是在外部压力的推动下启动、发展与完成的，这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过程，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多方协作共同推进。需要说明的是：大学的全方位与系统性转型，并不意味着转型过程所涉及的多方要素是同步推进或平衡发展的。

无论是实现一个国家的整体高等教育体系转型或一所大学的转型，都需要厘清自身的初始“型态”、过程“型态”与目标“型态”（理想“型态”），即人们所说的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目前所处的位置，这是将大学转型落在实处的基本要求。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或一所大学的转型，从初始“型态”到目标“型态”，其转型过程都有自己的阶段性或时间特征。如果置于历史的时间链条上考察，大学转型是一个阶段性过程，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定性，而非一个不间断性过程。换言之，任何大学都不是一直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转型完成之后往往有一个“定型”阶段。这个“定型”阶段既是上一次转型的巩固过程，也是酝酿下一次转型的生成阶段。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经过几年的“院系调整”之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进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定型”阶段，转成了今天的高等教育“型态”，即具有明显苏联特征的

大学之“型”。从转型的时间周期来看，此次转型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定型阶段则比较长，直至今日还存续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之中。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层面，都亟须一种新的视角来判断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之“型”。

虽然我国已经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和大学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充分认识，在行动上也有了许多尝试，但在要求大学转型时却存在着如下误区。

第一，对大学转型进行标准化的界定。行政部门往往明确规定大学转型的“达标”要求，以各种量化指标构建生成一个具体的大学转型“量表”，结果是以“转型”的名义构建了另一套大学“型态”与发展的评价体系，其结果往往与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相违背。

第二，对大学转型发展的形式化界定。主要表现为将大学转型“嵌套”在经济或非教育转型的话语体系中，进行某种程度的程序性、复制性表达，却没有把握大学转型的“本质特征”，即任何时代、任何高等教育机构的转型都应该围绕人才培养过程展开，因为大学的本质职能是人才培养。

第三，对大学转型提出时空上的同步要求，较少考虑不同高校的办学基础与条件。总之，大学转型的要求和界定应该体现与表达出大学组织的特殊性，应该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等最基本的大学功能出发，将大学转型的价值取向落脚在人才培养上，这既是大学转型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大学转型发展的永恒原则。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各项改革都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涉及问题之多、领域之广、矛盾之深，前所未有，大学转型发展时不我待。此时呼吁大学转型发展，要求大学尽快完成转型，这是时代的呼唤，这是民族的觉醒，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是一个不容错失的机遇。因为我国今天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高等教育，亟须大学“出手”解决一系列“卡脖子”问题；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一大批应用型人才。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拷问和冲击人类文明的时刻，在西方国家对我国不断“打压”的背景下，作为人类文化、社会良知和创新引擎的大学，必须在时代变革中主动转型，必须承担起这份唯我能做的使命。因为，大学是提升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加油站”和“动力器”，是保持和提升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风向标。

二、大学转型发展的历史经验

无论是一个国家的整体高等教育转型还是一所大学的转型发展都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西方国家的大学转型主要是依靠千年的时间慢慢完成。但这一转型模式显然不适用于当今中国，这不是我国大学转型发展的路径依赖。我国作为一个赶超型国家，尽快实现高等教育由“大”到“强”的远大目标，容不得我们模仿或走完西方大学转型的全部道路，更容不得我们通过消磨时间来完成大学转型。今天的国家转型和大学转型需要缩短时间，才能够跟得上时代步伐，才能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我们需要自信：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并没有达到像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的“天花板”，我国高等教育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依然可以走出大学转型发展的中国道路。实际上，大学的主动转型与被动转型之分，也可以称之为“人为转型”与“自然转型”之分。人为转型主要是指大学在外部压力到来之际采取的主动行为；自然转型主要是指大学基于外部的社会压力慢慢地觉醒。对“后发外生型”国家而言，推动大学的“人为转型”具有积极意义，这是时代赋予高等教育责任，也是每一所大学的责任。

大学发展史就是大学转型的历史。大学转型过程就是大学基因裂变的过程，大学转型的成功就是大学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然而，大学转型既是一个阵痛过程，也是一个“试错”过程，大学转型中的阵痛，既涉及制度设计，更涉及教育观念更新，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传统。仅有大学转型的概念和口号，或仅有转型的制度设计，不愿意“试错”或经历“阵痛”，转型依旧会“悬浮”在原有的模式上。如我国一些研究型大学，几年前开始尝试“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但由于“专业教育”的思想根深蒂固，本来具有引领意义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出现了停滞，目前部分大学甚至退回到原来“专业招生专业培养”的老路。因此，每一次大学转型都需要教育观念的重新启蒙，需要大学人的“新文化运动”。

大学转型首先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战略概念，即一个国家整体的高等教育系统转型。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转型主要还是靠某所具体的大学转型牵动，而后成为国家模式或经验。历史证明，一个国家整体高等教育转型成功的背后，往往有一所具体大学的影子，大学转型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转型的先导或基础。

关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转型，世界上曾有五次“经济中心转移”之

说。殊不知，世界五次经济中心的形成，几乎都伴随着被人们忽略的高等教育中心转移，即世界五次经济中心和科技中心的形成，都绕不开高等教育转型，尤其是高等教育职能的拓展。如德国对英法高等教育的超越，得益于把科学研究引入大学；美国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超越，得益于把社会服务引入大学，从而推动了国家层面上的高等教育“整体转型”。在20世纪初的知识经济时代，又有美国学者提出了“知识经济是站在大学的肩膀上”的判断。

关于一类高等教育机构转型，西方国家已经有了许多经验。首先来看美国的一类高等教育机构转型。1862年，美国国会出台了《莫雷尔法案》，在该法案推动下，美国建立了59所赠地学院，“资金必须用于资助至少一所具有学科领先水平的学院从事农业、机械等相关学科领域的教学研究，当然也不排斥其他科学和古典学科的教学研究，包括军事战略学。”虽然私人捐赠并没有这样的限制，但是许多企业家并不希望他们所捐赠的大量资金用来资助少数喜欢研究哲学和宗教的青年人。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赠地学院，几乎都成了研究型大学。再如美国在150年前有许多师范学院，其中人们最熟悉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就是其中之一，该校用了50余年时间，从一所普通的师范院校转为研究型大学。

再来看英国的一类高等教育机构转型。以1965年英国教育与科学大臣Crosland关于“高等教育二元政策”的讲话为标志，自1968年起，英国先后成立了34所多科学技术学院，这些学院以其灵活创新、开放多元的特点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成为英国“双轨制”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其后30年间，伴随着英国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多科学技术学院在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出现滞后的现象，大学生构成也开始发生变化。于是在1991年和1992年，英国政府先后出台了《高等教育：一个新框架》和《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批准多科学技术学院具有与大学同等的地位和学位颁发权，最终多科学技术学院全部转型为大学。按照高等教育“学术漂移”理论的解读，这一转型过程主要源于多科学技术学院对英国经济结构调整、未来大学地位以及社会对高等教育需求的主动转型。

最后看一下日本的一类高等教育机构转型。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推进，日本政府于2004年启动了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这是战后日本国立大学管理体制转型的重要举措。在此之前，国立大学长期作

为行政机构的一部分而被置于文部科学省的直接管理之下，从而导致大学的官僚化、行政化色彩日趋浓厚，已经完全不适应市场化变革。经过十年左右的推动，日本国立大学已经拥有了独立的法人资格，并从此摆脱了文部科学省的直接管理。

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和大学转型的经验来看，建立新大学也是一个国家推动整体高等教育转型的重要手段。如19世纪中期的英国“新大学”运动，美国19世纪中后期的赠地学院。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也曾采取了类似战略。再如我们熟悉的美国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欧林工学院，英国的华威大学以及今天美国的密涅瓦大学等，都属于“新大学”范畴。正是这些“新大学”，起到了大学转型发展的示范意义。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型态”，在世界上本应具有独特的位置，如职工大学、电视大学、业余大学、企业大学、自学考试、国家学历文凭考试等，其“型态”十分丰富。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不知不觉中这些具有“本土化”特点的大学“型态”基本消失，或者说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作用迅速降低，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一所大学的转型可分为模仿的转型发展、探索的转型发展和引领的转型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此类案例很多，恕不一一举例。对我国大学而言，历史上的做法主要是模仿，尤其是在模仿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了“型”的形式，忽略了“型”的形成过程，更忽略了“神”和“定型”的过程。因此，我们现在提倡的大学转型，要从模仿走向超越，从探索走向引领。打一个简单的比喻，今天的大学转型就相当于人们使用的手机，尽快完成从“功能性”手机向“智能性”手机的转变。

从认识层面上看，我国对高等教育和大学转型重要性的认识不谓不深。但之所以转型过程和结果难以令人满意，主要是我们对西方大学“型态”的认识主要还是横断面的解读，或者是基于结果的解读。对西方大学转型过程的忽略，使得我们今天的大学转型过程陷入了困境，缺少了“抓手”。其实，在高等教育的历史长河中，大学是一个惰性较强的系统。西方的16世纪至17世纪被称为高等教育“冰河期”，大学被称之为“象牙塔”或社会组织当中“最保守的机构”，都是直指大学“天然”的惰性。只有在文艺复兴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西方才开始大学转型。二战之后，各国大学转型的速度加快，今天更进入了快车道。我们今天熟

悉的乃至推崇的西方高等教育“型态”，如创业型大学、开放大学、服务型大学等都是二战后的产物。在我国，曾几何时，高等教育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同样是在讽刺大学的惰性。

三、我国大学转型发展的特殊性

百年以来，我国大学转型的速度和力度等，在全世界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转型造成的成本和代价也很高。如从书院转学堂再到近代大学，从新中国成立前学欧美、学日本、学德国，新中国成立后完全照搬苏联模式，改革开放后又开始重新接触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模式。短短一百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经历的变革乃至重塑，在大学历史上都是较为罕见的，其中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这本应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在新时代重新出发的宝贵资产和智慧来源。但由于我们对历史上的大学转型既缺乏理性总结，更缺乏深刻反思，几乎淡忘了历史上每次大学转型带给我们的阵痛，忘记了历史上的转型留给我们的遗憾，也忘记了历史上的转型带来的大学文化和制度“断裂”，好像也想不起来曾经给我们留下了哪些经验和教训。每一次大学转型几乎都是一次重新开始，都是另起炉灶。回溯我国百年大学转型发展走过的道路，历史似乎与我们兜了一个圈子，开了一个“玩笑”，又回到了大学原来的起点。如今天的大学“型态”，在“外型”上与西方大学十分接近，但在骨子里似乎还是苏联之型。再如，越是从宏观层面和“外型”上看，越觉得已经完成了大学转型，可越是深入到大学组织内部，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内部、学术组织内部、学科架构内部、专业设置内部、知识体系内部、课程体系内部等，就会觉得转型还根本没有完成。

我国大学转型发展的所有问题都有自己的阶段性，这是由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性决定的。今天我国大学转型的特殊性，根本上源于且基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代背景。时至今日，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和个体的大学，看似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洗礼，似乎早已摆脱了计划经济的藩篱，其实并没有完成脱胎换骨的变化。就以大学分类来说，早在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提出了“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的要求。然而到现在为止，国家层面的高校分类体系始终没出台。究其原因，高校将“分类政策”寄希望于国家制定，而国家是希望高校能够完成自我转型之

后再确定分类政策。由于两者之间的思维不匹配，因此高校分类问题迟迟没有解决。而当高校没有完成转型的时候，国家政策也很难出台，这就是当今高校分类陷入困境的原因。当然，这是时代和国情的特殊性决定的。因此，深入理解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之“型”，是新时代转型必须回答的问题。

大学转型发展实际上是跳出路径依赖的过程，是形成本土化高等教育“型态”的过程，是根据社会进步不断调整高等教育“型态”的过程。但由于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是“舶来品”，一直采用的是“跟跑”模式，既形成了相对“固化”的路径依赖，也形成了相对固化的外来“型态”，与本土化的国情难以匹配。如前所述，我国几乎尝试了西方国家主要的大学形态和治理模式，但始终都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水土不服现象。实践告诉我们：“转型”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形”或“型”，而在于内在的“神”，仅有其“型”没有其“神”，往往就是一个“四不像”，这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现象。

从表面上看，今天我国大学转型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似乎是制度设计出现了问题，其实并非完全如此，更深层的原因还是传统文化和大学基因在起作用，与我们的教育惯性和教育记忆紧密相关。如今天大学的管理者和教师群体，几乎没有接受过学分制和绩点制，没有接受过跨学科教育，没有接受过创新创业教育，没有接受过通识教育，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在线教育……而上述做法都是今天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和方向，都属于大学转型发展的范畴。即使对上述改革诉求略有所知，也仅仅是一知半解。因此，真正实现大学转型，就要提升大学治理能力和水平，需要我们与教育惯性和教育记忆作斗争，这实际上就是转型发展的过程“博弈”。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在大学转型中起的作用，是解决大学转型发展之“神”的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大学惯性与教育记忆，其实都属于大学文化的范畴，文化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深深地影响着和制约着我国大学转型。文化和教育观念不转变，实践中的大学转型势必困难重重，势必要打一些折扣。

今天我国的大学“型态”，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产物，在大学师生乃至管理者心中，仍然习惯于苏联模式下形成的学习观念、教学观念、管理观念、评价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尽管近年来

引入了许多西方的教育理念、方法和管理制度，但在实施当中往往大打折扣，这是今天大学转型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破解这道难题呼唤着对大学文化、教育文化、管理文化以及由此所构成的整体大学文化的时代反思与重构。

从世界范围看，高等教育问题尤其是一些深刻的内在问题，使得大学转型滞后于社会期待成为一种常态，对于社会 and 大学自身都具有消极影响，这不由让人想起曾经在美国发生的一幕。1995年，时任美国联邦教育署长的欧内斯特·博耶发表演讲指出：“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事实上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的一部分。”当时的背景是：美国大学的科研与教学矛盾日益凸显，大学生学习和人才培养质量受到冲击，人们都在讨论科研与教学的矛盾。而博耶跳出这种线性思维，指出埋藏在科研与教学表面现象背后的罪魁祸首，是急功近利的大学文化生态，造成的是师生间的过度竞争，滋生了各种学术研究和教育的怪相。从上到下，从教师到学生都很焦虑，在这样的氛围下，不仅教学质量受到冲击，而且同样产出了大量为了应景的低水平的科研成果。归根结底，是大学精神的衰落。人人都非常焦虑，身不由己地被卷入这个绞肉机中，同时也滋生了各种学术不端与教育怪相。博耶对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乱象提出批评之后，许多大学领导者和思想家们，也相继表达了类似观点。如德里克·博克所说的“回归大学之道”，刘易斯说的大学正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就是意在找回大学之魂。在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今天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中美之间的博弈愈加尖锐，快速发展的我国高等教育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压力和由“大”到“强”的迫切期待。从国际环境来看，近期中美高校之间的人文交流出现了停滞，数百名赴美留学生遭到拒签。从国内来看，大学面临着来自政府、社会、师生等多元的价值诉求。此种状况与当时的美国高等教育相比，其中一些具体问题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其表现形式更加复杂。显然，面对一系列挑战，新时代提出的大学转型更需要跳出平面思考，需要立足于中国实际问题再出发，需要立足于人才培养这个大学转型最重要的问题，重新思考我们向何处去？在这个转型的时代，大学转型重新回归理性、回归常识；需要正视转型、重视转型，并在实践中研究转型、探索转型，建立符合国情的大学转型理论和实践模式。

四、结语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从上至下对加快大学转型已经形成了高度共识，在实践中也探索出了一些转型经验，但整体的大学“形态”仍处在新旧交替之中，大学转型发展还没有迎来真正的转折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国家的大学转型都是扎根本土化的办学过程，是基于本土文化的重塑过程。当前我国大学转型的困境，就在于原来的计划经济之“型”根深蒂固，在某些领域甚至存在着集体无意识，尤其是一些根植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仍然留存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之中，并对当前大学转型发挥着明显的牵制作用。因此，新时代的大学转型需要认真反思和总结国际和我国大学历史上的转型经验，寻找大学的转型规律。

（源自：《中国高教研究》）

“重心下移”激活二级学院办学活力

作为高校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级学院治理不仅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主题，也是当前高校治理的热点之一。基于目前部分高校二级学院存在治理理念滞后、党政二元结构难以耦合、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矛盾、配套制度不健全、监督保障难以发挥实效等问题，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在借鉴世界一流大学有关二级学院治理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管理重心下移、赋予二级学院办学自主权、完善“四位一体”的内部权力结构、落实监督保障措施等方式，初步形成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多元共治、运行有效的二级学院治理体系。

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多元共治、运行有效的二级学院治理体系如何形成？

- 管理重心下移
- 赋予二级学院办学自主权
- 完善“四位一体”的内部权力结构
- 落实监督保障措施

树立“自主办院”的治理新理念

将二级学院作为高校治理的重要主体。学校明确了和二级学院在行政管理、科研、教学等方面的权力及职能边界，在工作方式上减少对二级学院的管控，发挥宏观指导、服务咨询、监督保障等作用，而且注重引导二级学院确立“自主办院”的基本理念。在二级学院对高校、政府部门、社会中介组织等的角色定位、职能边界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要求二级学院不断调整与完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权力之间的关系，既注重治理结构的扁平化，各治理主体的分权、共治与制衡，又关注各治理主体责权利的统一、沟通协调等治理能力的提升。把学院自律、增强自主办学能力与师生员工等的评价、监督密切结合起来，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等传统问题的产生。

规范二级学院治理结构。学校在系统分析各个二级学院办院历史、学科建设、发展定位等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包括价值追求、主体构成、机构设置、治理方式等要素在内完整的学校及二级学院治理结构，并以此为依据，不断提升各二级学院治理主体的规划、协商、处理问题等方面的能力。针对师生员工反映强烈、治理难度大、易出现管理漏洞的领域，明确要求二级学院强化制度规范，并从机构设置上明晰职能分工、人员配置等，确保二级学院治理的顺利进行。

把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及制度建设放在首位。基于二级学院治理是一个建立及完善制度规范、逐步形成新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机制的过程，二级学院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视为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并以此为中心，不断加大力度健全相关的组织结构、完善制度规范。如，进一步明确学院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完善其中的各项规范程序，明晰对成员进行必要的制度约束等，保障二级学院中心工作更好地完成。

健全“职责清晰”的制度保障体系

进一步明确章程的法律地位、完善其内容。学校邀请有关专家、校院领导、二级学院师生代表等，在深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全面完善章程内容，对其中二级学院治理目标、组织构架、核心工作、人员设置等进行充分论证，既明确学校与二级学院的关系、学校应提供的支持与帮助，又厘清二级学

院的角色及职能定位、内部各个群体的权责与义务，等等。

进一步完善二级学院的制度体系。基于个别二级学院章程、相关委员会、有关制度实施细则缺失等问题，学校提出要有效支持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工作，就迫切需要细化二级学院章程，并进一步强化学术权力、健全各个委员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形成以学院章程为基本准则，机构权责明晰、制度规范合理、可操作性强、师生员工广泛认同的完整的二级学院治理制度体系。

健全激励制度，强化学院间合作、学科交叉融合。学校引导并支持学院之间，以及一级学科内、不同学科间的资源整合、平台建设和优势共享，重视在学科建设、重大项目研究中的学科交叉与融合，以及各种资源的统筹使用、协调发展。如，通过增加学校激励制度，引领相关学科集中、研究领域集群、研究课题集成等形式形成协同创新的科研机制；通过设立二级学科合作的“研究院”“攻关团队”等一体化的学术机构，构建学院间学术研究的新高地；通过“系统平台—共同体合作”等模式形成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等等。

构建“四位一体”的内部权力结构

“四位一体”指由党支部所代表的政治权力、院长及行政班子所代表的行政权力、教授等所代表的学术权力、教职工和学生所代表的民主体力所组成的二级学院权力结构体系。优化二级学院权力结构，既要充分发挥各个权力主体的作用，又要实现相互之间的协调与制衡。

坚持党支部在二级学院治理中的政治核心地位。党支部强调集体领导，在具体事务管理中，既支持院长等行政班子成员在其职责范围内独立开展工作，又通过党政联席会、支部会等途径实现对院长行政权力的监督。

保证院长及行政领导班子在二级学院治理中的行政主体地位。基于部分高校二级学院中存在的党政二元结构难以耦合、院长与书记存在矛盾等问题，学校在坚持党支部集体领导的前提下，注重完善行政管理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及操作规范，既保障党支部成员、师生员工的知情权，又使院长等行政领导班子成员能够自主决策、创新性地开展相关工作。

发挥教授治学的主导作用。基于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委员会在学院治

理中的重要作用，学校要求二级学院的章程及相关制度中应明确教授治学的重要性，明晰党支部、行政在治学方面的权责、工作职能及边界，保证教授治学在学科建设、博士硕士点评估、学位授予、职称评审、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决策权、决定权。既维护学术权力，又为具体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及相关工作提供支持与服务，保障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在学院治理中作用的发挥。

保障师生员工的参与权、监督权。学校要求二级学院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如定期召开党政联席会、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程序等，同时及时更新学院网站信息，公布涉及学院发展的重大事务及关系师生生活等重要事项，并从制度上明确师生员工对党支部的政治权力、院长等的行政权力、教授等的学术权力的履行状况进行监督与反馈。

畅通“多元主体”的监督反馈渠道

拓宽监督渠道，加大信息公开。以章程为依据，学校各二级学院不断完善各项检查、评价与督导制度，补充完善教职工、学生等参与相关事务的主要内容、议事程序、途径方法等细则，明晰师生权力的职责与边界，同时，加大办院信息公开力度，使高校、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师生员工、学生家长等全面了解办院信息，更好地参与二级学院治理。

注重提升各个治理主体的监督、反馈能力。通过多种形式、设立多种活动不断提升师生员工参与二级学院事务的意愿及能力、激发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关注师生员工对二级学院发展定位、课程设置、培养方式、科研创新、社会实践等方面提出的意见及建议，注意疏通师生员工与学院领导、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保证师生的评价与监督能够发挥作用、达到最佳效果。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北师大不仅注重管理重心下移，平衡二级学院内外利益相关者的权力义务、职能边界，而且关注协调好二级学院内部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之间的关系，逐步构建扁平、分权、制衡型的治理体系，为真正形成“宏观有序、微观搞活”校院两级治理的良好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源自：《中国教育报》）

人才培养

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创开辟人才培养新路径（以东莞理工学院为例）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基本使命。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东莞理工学院主动回应技术创新、产业变革，在深度服务区域发展中识变、应变、求变。2012年开始，学校基于现代产业需求，依托区域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理念，与行业龙头企业及专业镇街、园区、境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合作，整合优质资源，推进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开启“新工科”探索实践的新赛道。

“十三五”期间，新增现代产业学院5个，现代产业学院总数达到9个。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现代产业学院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被吸收到教育部“新工科”建设的政策文本之中，成为新工科“管用能用好用”的示范性成果之一。

2016年12月，先进制造学院（长安）在全国3C重镇长安的产业园区建立。长安镇政府提供办学场地、基础设施、教学仪器设备、经费支持等。东莞理工学院负责日常管理、开展教学与实训，并为当地企业提供技术培训与服务等。东莞市机电学会、ACMT协会和奥普特科技、长盈精密等众多企业纷纷以各种形式加入产业学院建设与人才培养过程。先进制造学院（长安）拥有独立法人身份，实施特殊的人事聘用制度和财务制度，形成了独特的政产学研协混合所有制。

2019年9月，学校与常平镇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共建的东莞理工学院（常平）智能制造与创意设计学院，力求在文理工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科技创新服务、自我造血能力培育和港澳高校资源整合等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这种教学组织创新的尝试和突破，改变了基于学科逻辑配置办学资源的传统组织建制，开辟了区域特色创新要素参与高等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路径，创建了基于产业需求逻辑的新型工程教育组织，在人才培养新

型组织平台建设上走出了一条新路。

作为新型办学组织，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在实践创新、制度完善和理论研究上日臻成熟，形成了地方高校新工科建设的莞工经验，《多模式特色产业学院推进产教协同育人的改革与实践》荣获2018年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8年6月，学校作为教育部指定的唯一地方院校，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专题发言，介绍服务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培养知行合一实干型人才的经验做法，引起高教界和社会热烈反响。

破“五唯”构建教师队伍

教学组织创新推动了教师队伍结构的变化，现代产业学院以培养学生工程能力为中心，教师队伍的组建破除了“唯论文、唯帽子、唯学历、唯职称、唯奖项”的限制，既有本校老师，也有来自企业的CEO、技术经验丰富的工程人员和行业协会专家等。先进制造学院（长安）自主招聘的胡德旺老师，就拥有20多年的企业工作经历。在西门子智能制造学院，学生需跟随西门子工程师参加智能制造一年的项目实训。

同时，学校通过职称评定等“指挥棒”，引导本校教师成为“双师双能型”教师，决胜长远。华为网络学院的许多教师均取得了华为认证讲师或高级讲师资格，东莞理工学院的教师通过培训与师生通过认证的数量在华为ICT全球体系里排名数一数二。

“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的充实不仅提升了人才培养能力，而且提升了教师服务地方的能力。2020年初，新冠肺炎暴发，医疗物资告急，东莞市科技局发出关于组建技术专班进驻医疗物资生产企业的通知，先进制造学院（长安）院长助理邓君、华为网络学院的魏文红教授等被选为首批进驻东莞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化身工程师提供技术支持，助力口罩产能的提升。

现代产业学院积极实施“三五四三”人才培养模式。即外部资源“三导入”，产学融合“五共同，实践教学“四层次”以及学生发展“三方向”。

学生工程实践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今年10月份，vivo公司再次到先进制造学院（长安）举办校园招聘会，这是vivo公司连续4年来这里举办校园招聘会。“他们专业能力扎实，动手能力特别强，上岗速度很快，入职后一个月就能上岗。”对先进制造学院（长安）的学生，vivo公司生产制造部经理涂金科不吝赞美之词。

2019年，vivo公司从全国各地校招员工48人，其中5人来自先进制造学院（长安）。在涂金科看来，这批学生学习能力和领会能力强，能够主动沟通、吃苦耐劳。“能够从学习思考中引申出更多问题，并且自己探索解决问题。”

现代产业学院以产业需求为牵引的人才培养模式，大大提升了学生工程实践与创新创业意识。李楠是粤港机器人学院的首届学生，回忆起在粤港机器人学院学习经历时说道：“粤港机器人学院更侧重学生的自主研发和自我学习能力，我们会有各种赛事以及实践项目，需要多专业小组配合，并通过编程、设计、搭建和项目转化的方式完成。这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产品开发迭代流程，相比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来说，这样子更加能够锻炼全方位的能力。虽然会比较累，但是收获也是超乎想象的。”

粤港机器人学院于2017年组建了行者机器人队，团队通过一届一届队伍传承以及自我探索的方式，在参加各级各类机器人大赛中培养创新创意精神和提升工程实践能力。通过几年的努力和团队的传承，2019年和2020年，团队连续两年夺得ROBOCON机器人大赛全国一等奖。

先进制造学院（长安）的楼铮、陈海建2019年毕业后进入vivo公司，三个月后，楼铮、陈海建就能够接手IE生产成本控制工作。在大型工业制造企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岗位，一个零部件节约几毛钱，都可能省下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成本。楼铮、陈海建在先进制造学院（长安）学习期间就已经系统地接受过IE成本生产控制的专题学习。

老师和学生联合研发项目，企业工程师参与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在现代产业学院，学生在真刀真枪的实训中练就真功夫。截止到2020年11月1日，现代产业学院学生参加各类竞赛获奖395项，参与发表论文71篇，参与授权专利158项。

现代产业学院的探索实践带动学校新工科建设不断走向深入，建设了

一批新工科研究项目，发表了一批高水平研究论文，推出了一批新型教材和教学案例，学生工程实践创新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也获得了高教界瞩目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成洪波受聘为教育部新工科建设工作组专家，马宏伟受任为第二批教育部新工科个性化培养模式项目群召集人。

在迈入“十四五”的新征程中，学校将坚持“产学研创”理念，不断深化协同育人机制改革，强化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的有机衔接，打通人才培养与现代产业需求之间“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提升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成效，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以现代产业学院助推新时期产教融合

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提出要以区域产业发展急需为牵引，面向行业特色鲜明、与产业联系紧密的高校，建设若干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多主体共建共管共享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现代产业学院是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途径，是时代发展到新阶段的产物，也是产教融合深入推进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现代产业学院具有鲜明的特征：一是人才培养理念更加注重质量和效果。现代产业学院的建设要求转变过去单一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首先，坚守“质量第一”和“服务行业”的原则，深化人才培养标准与企业人才需求一体化，量身定制产业发展的硬性（实用性）人才，精准培养企业所需的高端人才。其次，遵循“产业需求牵引逻辑”，满足产业发展对人才能力素质的需求，改变基于知识传递的传统人才培养逻辑。从更关注知识的高效传递和基本技能的掌握转向更为注重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此推动产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迭代。二是办学主体关系更加突出企业的教育实体作用。大学和企业是产业学院运行的重要载体，其合作内容和方式需要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不断创新。现代产业学院的优势在于校企双方共在一条船上，彼此利益交错，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两张皮”等问题，是对松散校企合作本质上的超越。产业学院以满足企业需求为目标，直接服务于产业发展，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高校需要主动“让权”于企业，赋予企业更多参与人才培养的主动权，包括参与资源整合与配置、学生管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等，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

需求的紧密结合。三是管理体制机制更加强调紧密性、协同性和灵活性。建设现代产业学院需要创新管理体制、重组机构,从根本上看,主要是由于校企合作的体制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企业的积极性不高,人才培养的效果不显著。这种建立在学科专业基础上的管理体制不利于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需要改变仅仅将学科专业进行机械化整合的组织模式,改变产教融合中企业和大学各自分散的现状。

当前,建设现代产业学院,促进产教深度融合,需要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转变固有的人才培养范式,构建“学习共同体”。由以知识传授为主向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主转变,由注重学生知识的掌握向更加注重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转变,由基于知识逻辑构建评价体系向基于技术创新构建评价体系转变。现代产业学院是当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有益探索,剔除教育的“工具性目的”外,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这种发展超越简单的知识传递,以学生的主动学习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这不仅是一个“传道授业”的过程,更是一个师生共同“解惑”的过程。在由大学、企业、学院共同组成的“生态圈”中,学生、大学教师、行业教师等组成“学习共同体”,共同建构生成知识。在新的培养范式下,需要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改革学生学习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可通过定制专业、导师、课表等方式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促进个人能力的提升。同时,发挥项目导向制和设备实操的培养特色,帮助学生从打基础到实操训练、参与项目部分工作、独立完成项目工作的个人成长。第二,发挥大学与企业的优势,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应淡化大学育人、企业用人的固化分工,打造校企共同育人的伙伴关系,实现校企双方共谋发展、共同治理、共享资源。在这样一种关系下,应提高企业行业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参与度,参与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使培养的学生与行业的发展更有针对性,破解育人与用人之间的错位难题。改变过去松散的校企合作模式,破除“课堂教学”与“企业实习”二者割裂的局面,让课堂走进企业,在企业实践中创建新的课堂模式。基于对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前沿发展领域的分析,大学与企业联合组建科研团队,共同

申报科研项目，开展应用型研究，以研究反哺教学，完善校企人才培养协同机制。第三，打破传统学院组建模式，由以学科专业为核心的模式向以行业产业为核心的模式转变。现代产业学院的建设应打破传统模式，遵循“行业产业发展的逻辑”，以产业需求为引领，重组学科领域和相关专业。在新的模式下，学院不再是按照“兵种”的概念开展人才培养，而是将整个产业作为“战区”，以产业发展为核心，培养具备综合实践能力、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组建与行业企业无缝对接的新型组织，需要分析掌握区域内行业、产业、企业创新发展需求，找准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点，分析自身与当地行业、产业对应的学科与专业，进行重组，改革课程体系，与行业产业发展紧密对接。同时，切实分析企业的用人需求，了解企业对人才知识结构、实际技能、能力素质的要求，改革教学体系，与企业共同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实行“订单式”“定制式”“个性化”的人才培养。

（作者：浙江农林大学校长教授）

党委发展规划部（处）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平安街43号

邮 编：114000

办公地址：行政楼320室

联系人：朱世玉

联系电话：0412-2960733
